

《三家巷》是欧阳山的代表作，它虽不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列，却也属“红色经典”，出版60多年来多次再版重印，读者众多。和其他“红色经典”相比，《三家巷》的写法或许有些“另类”。由于这种“另类”，我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阅读它，就有着不同的感受与理解。

第一次阅读，是1979年秋天。1978年夏，我从高一跳级参加高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月踏入大学校门。那时，中外文学名著纷纷再版重印，学校图书馆为满足如饥似渴的学子们，新购进的图书来不及上架，便在贴签编号后马上外借，我们则如闯进菜园的饿牛，每周借阅好几本。记得最早借阅的是蓝色封面的《骆驼祥子》《家》《子夜》《倪焕之》和绿色封面的《曹禺选集》等现代文学经典，还有内附精致插图的《悲惨世界》《高老头》等外国名著，再就是“十七年”期间的当代长篇小说。听同班比我年龄大一倍、已有妻室儿女的“老三届”同学称赞《三家巷》如何如何好，我也借来看。但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我，读后感觉它不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农村生活》曲折惊险，也不及描写冀中农村生活的《红旗谱》亲切，对之也就没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对于中国古典名著，我也是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胜过《红楼梦》《西厢记》。

第二次阅读，是研究生毕业后在高校任教、准备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时。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就是《红旗谱》与《三家巷》。为讲好课，必须重新细读文本。这次重读，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由于已经恋爱结婚，对人生意义与价值也有更深的思考，阅读时便不由自主地被带进周炳的生活世界之中，情感随他的起伏而起伏，甚至和他一起为区桃的牺牲而流泪、为陈文婷的背叛而心痛、为胡杏的受虐而愤怒。但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基本未超越教材的阐释。

第三次阅读，是2005年我的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获批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以少年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身份阅读，第二次是以青年教师的身份阅读，那么这次则是以中年研究者的身份阅读。作为研究者，需要以文学鉴赏与历史审视的双重眼光扫描“十七年”时期的著名作品，评估其各自的文学价值，在纵横坐标中给予其文学史定位。《三家巷》属于“革命历史小说”：它直接表现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间接提及了中山舰事件，还让主人公周炳与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直接交流，叶剑英、叶挺、周恩来、张发奎等历史人物也一度登场。按作者的说法，它反映的是“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

## ◎编辑荐书

《堂叔堂》是刘庆邦的最新长篇小说，用12个篇章讲述了作家14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敢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私精神。堂叔的人物群像，勾连起人与土地、人与权力、人与时代的关系，展现了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堂叔堂》 刘庆邦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报电（文一）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举办的云南拉祜族作家李梦薇儿童长篇小说《阳光无界》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品以少年视角再现了中缅边境儿童与邻国同伴月光般纯净的友谊，展现了热带雨林神秘壮观的景色，孩子们尊重长辈、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故事和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大人们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乐观、朴实善良的人性之美。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这是一部有诗性的散文文化小说，充满了爱和温情，表达了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永恒的友爱。作者熟悉拉祜族心灵世界的细微变化，体现了该民族的生命观、宇宙观，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质。



我心中的红色经典

# 三读《三家巷》

阎浩岗

史事件，间接提及了中山舰事件，还让主人公周炳与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直接交流，叶剑英、叶挺、周恩来、张发奎等历史人物也一度登场。按作者的说法，它反映的是“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

与包括《红旗谱》在内的“十七年”时期其他小说相比，《三家巷》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阶级关系的处理：《红旗谱》虽并未完全以阶级划界（贫雇农老套子并未参加暴动、朱老星与地主冯老锡关系尚好），但地主和农民并不通婚（冯兰池想娶春兰为妾遭拒），而《三家巷》里铁匠周家与买办陈家、官僚地主何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和恋爱纠葛。《三家巷》里周家三兄弟参加革命并非由于经济和物质的困境：周家是世传铁匠，虽远不及陈家、何家富裕，却也衣食无忧，否则陈万利绝不可能同

## 经典回放

《三家巷》是欧阳山（1908—2000）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部，初版于1959年。小说以广州一个叫“三家巷”的小巷内居住的周、陈、何三家人为主要人物，以发生在广州城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借出身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三家青年的不同成长和发展以及三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了1919至1927年间中国的时代风云。主人公周炳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1962至1985年，其续集《苦斗》《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陆续出版。

意儿女与之通婚。周家长子周金在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次子周榕、女儿周泉都读得起中学，周榕毕业后还任教员；三子周炳最后放弃读书，主要是因厌学以及自尊。说到底，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生存，而是出于对现状不满——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希望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使自己的人生更充实、更有意义。这样的描述不教条、不概念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

由于作者注重将铁匠周家和买办陈家人当作完整丰满的“人”而非阶级符号来写，所以在作品中，他们并非非生下来就是“天敌”，就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他们之间通婚结亲、子女还一度一结合金兰，就不足为奇了。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欧阳山又注意表现阶级属性对人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如果不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周陈两家如果不是直接卷入这些事件，他们不同阶级出身和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思想情感与立场差异或许不会立即凸显，同学时期的陈文雄、周榕、何守仁还可以结盟换帖、共论理想抱负，而一旦接触实际，矛盾冲突就无法避免：周泉嫁到陈家，虽无物质之虞，却很快感到没有地位、不被尊重；陈文婷一时冲动与周榕私奔同居，回到广州后周家无法给他们提供婚房，她的热度便逐渐冷却下来，最后与周榕分手，嫁给自己原先并不喜欢的何守仁；陈家四姐妹中，长女陈文英、四女陈文婷都爱慕周炳，次女陈文婷一握周炳也不由自主地脸红，但陈文英的“爱”是出于对美男的天然冲动，陈文婷的爱也限于青春少女的浪漫幻想。她们与周炳并无精神上的相互理解，他们并非知音，所以周炳面临失业逃亡困境时，陈文婷就抛弃了他。陈家子女都是把物质享受看得很重的人，而周家兄弟淡看物质，他们更看重社会正义与个人理想，甚至不惜为理想和正义而牺牲个人生命。

这样，周家三兄弟参加革命的动机，已超越生存和生理乃至安全需要，而主要出于孤独个人在对生存价值产生怀疑时所产生的归属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革命活动中，他



们的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人生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实现，这就更接近革命的最终目标。由于《三家巷》对人和阶级性关系的辩证处理，在出版时曾引发巨大争议，而在今天看来，那些否定它的理由已站不住脚。当然，《三家巷》仍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比如作品中所有“超阶级的爱”虽一度发生，却最终皆归失败，陈家兄妹最终无一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历史上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最终毅然决然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

有趣的是，《三家巷》还明显受到古典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影响：《红旗谱》所受《水浒传》的影响体现在朱老巩、朱老忠、张嘉庆和李霜泗们的侠义性格方面，所受《红楼梦》影响体现在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方面；《三家巷》里周炳的俊美多情以及人见人爱的“女人缘”颇似贾宝玉，但周炳比宝玉更具“男人气”，是对宝玉的超越和“升级”——他见区桃遭欺而愤然出手，在震南村领衔“十大寇”，令人联想到梁山好汉。

反复品读，感觉《三家巷》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魅力方面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它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同年龄、身份、学识、阅历的读者阅读《三家巷》，不仅能了解党领导人民革命的早期历史，重温百年前追求进步的青年们战斗的人生历程，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澎湃激情与高扬的理想情怀。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部写得地道、读来筋道的脱贫小说

——专家热议王松长篇小说《暖夏》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暖夏》王松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开会，镇长故意用激将法，让北金家坑村长张少山和南金家坑村长金永年“打赌”，看两年之后哪个村日子过得得好，故事从此展开。最终南北二村摒弃前嫌，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了经济、文化齐发展。

小说分为朱卷、兰卷、荷卷三部分，用丰满的人物、鲜活的方言、精彩的故事，突出了文化在新时代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塑造了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返乡青年形象——他们正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动力。

评论家李敬泽说，王松特别关注故事，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暖夏》反映了时代对作家小说创作思维的深刻影响，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乡村书写新的方向。评论家施战军说，《暖夏》是一部写得地道、读来筋道的作品。作家以一种宽容智者的视角带着感情写作，让作品既地道又筋道，既水灵又机灵。评论家黄桂元认为，《暖夏》把相声元素

融入小说叙事，描绘出一幅众声欢唱的乡村画卷。作家徐则臣认为，《暖夏》充分展现了文化和艺术在扶贫中的作用，同时在字里行间融入天津特有的韵味文化，在同类型题材中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评论家陈涛认为，《暖夏》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就像一幕活生生的电视剧，节奏明快、戏剧冲突不断，对话尤其精彩。评论家宋嵩认为，《暖夏》的结构在“一头沉”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子母喂”的写法，甩包袱的写法更是层出不穷，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王松说，回到年轻时插队的地方挂职、深入生活的经历，让他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找到了讲故事的新腔调和写作的新的矿层——天津文化。

与会专家认为，《暖夏》中有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碰撞，也有彼此之间的融合和转换，给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气象，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好作品。

## ◎新作评介

# 独秉秋气

——读《雪下了一夜》

李敬泽

胡竹峰其人有关秋气。按年岁，他是小先生，不是老先生。但提笔行文，老气横秋。老气横秋似不是好话，然在此处，是作好话来说。天行四时，一时为秋，秋之气为清、为爽、为苍劲、为高远，万物至此近老。古人文章之道，讲究得天地之气，竹峰当盛年而独秉秋气，是为异禀。

《雪下了一夜》，却不是秋，是冬天了。雪只管下去，干你甚事？可天地、风雪、山川、日月、草木、虫鱼，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竹峰的事，是世事，也是心事。心事浩茫连广宇，雪夜闭门与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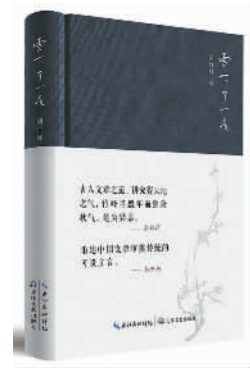
游，竹峰竟写了这样一本书。用一个“竟”字，是叹真真胆大，安敢如此。从《逍遥游》到《昆明的雨》，二十四篇文章全是古人写过的，从庄子到汪曾祺，各路神仙下凡，召集文曲星雅会，此事我不敢。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读《逍遥游》，读《小园赋》《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等，只能“观止”，观而叹，观而止，堂前打躬作揖拜倒便罢，未曾想过登堂入室，与大先生闲坐对饮。晚来天欲雪，能奔一局无？这些题目前贤做过，后生做不得吗？如今读了《雪下了一夜》，觉得此事其实做得。神飞六合，人人皆可逍遥游，登高望远，处处都是岳阳楼。

凡我读书人，心里人来人往，住着庄子、陶渊明、范仲淹、张岱乃至汪曾祺。是我，我不是我，我的文章出我手，天下文章在我心。写这本书，也不过把不敢的事，做成了该能做的事。以古人之风写今日万千，是难事是方向。有此一集，胡天胡地、竹峰挺秀，

这人亮出了来路去处。沿来路看一遍，感觉胡竹峰不枉一来，尽得古人风致；朝去处张望，又觉得胡竹峰势必放下古人，向远方去，向人群去，向家国天下去。盖文章，大业盛事也。所谓大业，所谓盛事，所谓文章之道，俱因古人心大。竹峰如尽得古人之心，则大矣哉！盛矣哉！“知道天凉好个秋”，竹峰少年，已怀深愁。怀此深愁，且更上层楼。

《雪下了一夜》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胡竹峰著



# 呼唤从“事件的文学”转向“人的文学” “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论坛举行

邹金涛

4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承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百余位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主题发言与小组讨论，对抗疫文学创作进行阶段性梳理、审视与总结，反思文学与抗疫的关系，并提出对未来创作的展望与期许。

与会学者认为，从目前的抗疫文学创作实绩看，文体形式多种多样，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刘醒龙的散文集《如果来日方长》与欧阳江河的诗歌《庚子记》等备受关注。诗歌方面，诗人们“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应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伦理常态，值得提倡，但部分作品也存在情感与思考未经充分沉淀而略显矫情虚浮的问题。抗疫诗歌实现突围应从自身寻找切口，而非仅仅依靠外在力量；事件大于文本、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避免。抗疫文学应坚持“文学是学”的立场，以“人”为旨归，关注具体个人面对疫情时的内心世界，呈现他们的“痛与爱”，展现疫情面前丰富的人性。

展望未来的抗疫文学创作，评论家们认为，应当从“事件的文学”转向“人的文学”，以真实生活为底色、以深邃思想作支撑、以真情实感为内核，展现文学的情怀和悲悯。从“史”的角度看，文学史研究者认为，应尽快将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口述史记录等工作提上日程，留存下全国人民和武汉人民抗击疫情的原生态记忆与伟大抗疫精神。

学者们呼吁：时代与现实呼唤更有深度、厚度与力度的抗疫文学，写作者应加大反思力度和书写的精神深度，超越作为素材的疫情，把疫情下的生活充分对象化，经过心灵内化张扬文学的诗性，努力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反映时代的总体性。

## 十月文学奖两届齐颁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4月16日，由北京出版集团、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主办，十月杂志社和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李庄杯”第十六、十七届十月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李庄古镇举行，“十月作家居住地·李庄”于李庄麦天官府揭牌。

第十六届（2019年度）十月文学奖获奖情况是：阿来《云中记》、付秀莹《他乡》获长篇小说奖；鲁敏《或有故事曾经发生》、田耳《吊马桩》、刘汀《人人都爱尹雪梅》、孟小书《请为我喝彩》获中篇小说奖；石舒清《九泉》、李唐《替代者》获短篇小说奖；陈福民《与你遥遥相望》、刘文飞《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获散文奖；张执浩《完整的彩虹》、潘洗尘《深情可以续命》获诗歌奖。

第十七届（2020年度）十月文学奖获奖情况是：吉狄马加《裂开的星球》获特别奖；钟求是《等待呼吸》获长篇小说奖；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沈念《空山》、张炜《爱的川流不息》、肖江虹《美学原理》获中篇小说奖；哲贵《仙境》、金仁顺《有真》获短篇小说奖；格非《麦尔维尔读礼》、苏沧桑《春蚕记》获散文奖；雷平阳《雷平阳近作》、荣荣《苍茫》获诗歌奖。

据了解，“十月文学奖”最早设立于1981年，40年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2015年12月，李庄古镇被确定为“十月文学奖”永久颁奖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第十六届（2019年）、第十七届（2020年）十月文学奖合并颁奖。

## 报告文学《革命者》：

### 向中外读者讲述英雄故事

本报电（曾宪钦）近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作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

《革命者》由何建明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紧扣“革命者”主题，讲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牺牲的革命者故事，是一部高扬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酝酿多年，踏访多地，查阅日记书信等珍贵史料近千万字，多侧面塑造了血肉丰满的革命者群像。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革命者》以磅礴的气势和抒情的文笔带领读者重回历史现场，呈现出昂扬向上、感人肺腑的文学力量。

据了解，《革命者》为中宣部组织实施的“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俄语版已出版，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版的翻译出版正在筹备中，《革命者》将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讲述给更多外国读者。

## 《诗人的圆桌》展现中外诗歌交流成果

本报电（曾宪钦）近日，吉狄马加新书《诗人的圆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为作品被译介最多的当代中国诗人之一，吉狄马加和世界诗坛联系紧密，《诗人的圆桌》即是他与阿多尼斯（叙利亚）、叶夫图申科（俄罗斯）、温茨洛瓦（立陶宛）、伊冯·勒芒（法国）、切赫·瓦塔（吉布提）等16位不同国家的重要诗人、诗歌翻译家深度对话的成果。书中涉及的话题包括当代世界与人类命运、文学的使命等。

《诗人的圆桌》虽然采用对话形式，但对谈双方都不限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讲述了各自与诗歌的故事、与其他诗人的交往。比如与叶夫图申科的对话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与阿多尼斯的对话，则完整反映了一个世界级诗人从不起学的少年，到得到总统帮助并最终成为一位大诗人的故事。

吉狄马加表示，《诗人的圆桌》一方面见证了自己20年来与各国诗人交流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是中国诗歌国际交流的成果之一。